

西方哲学语言转向的外驱力

○ 夏蓓洁

(合肥学院 外国语言系,安徽 合肥 230601)

[摘要]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是哲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过程。对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的发生,学界较多是从哲学自身发展过程中寻找原因。日常语言哲学家与理想的语言哲学家都以语言方法作为基础出发点使哲学形成语言学的转向,体现着哲学发展过程中的一种现象,并对现代语言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工业革命;西方哲学;语言转向

一、“语言转向”及其根源

“语言学转向”(the Linguistic Turn)作为一个哲学术语由古斯塔夫·伯格曼所著《逻辑与实在》(Logic and Reality, 1964)一书最早提出的。^[1]目前国内学者将“Linguistic Turn”译为“语言学转向”或“语言转向”。陈嘉映将“Linguistic Turn”译为“语言转向”,认为从本体论—认识论—语言哲学这三个阶段来看,还是说“语言转向”比较恰当。^[2]语言哲学与语言学哲学在概念上本来就有区别。语言学哲学与数学哲学一样并列为哲学的分支。哲学在其发展过程中被其分支——语言学哲学所取代,哲学转向了语言学哲学。语言转向时期恰逢西方第二次工业革命前后,社会发展迅猛,科学成果显著,为语言转向提供了语言现象—经验的大量素材。研究语言现象—经验的任务主要由语言哲学承担,“语言哲学就不再是哲学的一个分支,而是哲学本身,或者说是‘第一哲学’”^[3]。

语言和哲学历来是很接近的领域,无论哲学是否发生语言转向,它始终受到

作者简介:夏蓓洁(1962—),合肥学院外国语言系副教授,系主任,研究方向:英语语言学。

哲学家的重视。分析学派代表人物维特根斯坦就曾说过,语言的边界就是自我世界的边界。诠释学派伽达默尔也认为可理解的存在即语言。既然语言现象始终没有离开哲学家的视野,对于20世纪前后西方哲学发生语言转向的根源,人们所持意见不一,也不甚明确。普遍认可的几种归因大同小异,区别在于不同学派突出强调自身在其中的作用。现有观点认为,传统西方哲学已不能满足自身发展的需要,语言研究的发展为哲学重构奠定了基础。数理逻辑的运用、对古典哲学的厌倦、心理主义的逼迫、语言科学的建立和完善等是导致语言转向的根源。有少数学者提出,“由于社会的原因,哲学家已经不被相信可以完成自己的终极任务,只能做一些概念分析的事情。”^[4]社会需要哲学家们把“通过语言分析,澄清语词和语句的意义,使人们能以适当、准确的方式使用语言,从而有效地表达思想作为首要任务”^[5]。20世纪前后哲学发生的语言转向除了哲学自身发展的原因外,社会原因起重要作用。然而社会原因繁多复杂,上述观点的不足之处在于未对这两个关键问题做出明确解释。本文探讨究竟什么是影响语言转向的“社会原因”?这个“社会原因”是如何推动哲学家从完成过去提出的“终极任务”到实现哲学的“语言转向”?

二、工业革命是语言转向的必要条件

工业革命起于19世纪70年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有效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同时,新式交通工具和通讯手段的发明促进了文化的交流,推动了信息的传播,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和交往的方式,正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语言转向”开始发端并逐渐成为一种哲学潮流。

对于哲学的“语言转向”与工业革命之间的关系,辩证唯物主义早已从理论的角度科学地给出了答案。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哲学是一定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反映,其内容来源于社会。真正的哲学能够正确地反映自己社会的任务和要求。“哲学的发展离不开具体科学的发展和进步,具体科学是哲学的基础,具体科学的进步推动了哲学的发展。”^[6]如果说语言转向是哲学由以认识论为中心转向以语言为中心真正的哲学发展过程,那么“所谓‘真正的哲学’不是随便什么哲学,而是指反映社会发展要求,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7]。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说明,语言转向离不开工业革命的社会大背景并与之息息相关。西方语言研究的发展奠定了语言转向的基础,是语言转向的契机。简而言之,受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影响,西方传统哲学遭人厌倦,在实证主义冲击和心理主义逼迫下,西方哲学被迫进行“语言转向”,为哲学寻得一块立足之地。胡塞尔从理性的角度由语言意义进而分析意识结构,用现象学方法建立意向性理论,形成了“现象学”学派。分析哲学则通过逻辑经验主义转化和发展,以逻辑分析方法,通过对语言意义的分析实现“语言转向”。现在普遍认为:数理逻辑的建立,现代语言科学的建立和对诗性语言的研究三大语言研究学派的形成对语言转向具有关键作用。然而,在古典哲学的终结和三大语言学派的

形成背后起较大助推作用的则是工业革命。

(一) 催生了数理逻辑的产生

就哲学本身而言,传统哲学命题在表达上晦涩而混乱,本质上毫无意义,日常语言也存在逻辑上的混乱。哲学的心理主义由于对语言—命题意义的研究具有客观的贡献,在一定时期占了上风,对传统哲学产生了冲击和逼迫。但是哲学心理主义对心理活动的解释存在主观成分,不符合当时“唯科学论”的时代背景,尤其受到现象学派的猛烈攻击。因此,部分哲学家寻求建立一套理想的人工语言,一方面克服传统哲学命题上表达含混不清的问题,另一方面代替日常语言,解决当时哲学的混乱局面。此时,工业革命的成果和社会实践的需要为哲学引入数理逻辑提供了条件。

工业革命至少在两个方面对数理逻辑的产生有所贡献。一是自然科学成就和发明应用成效促使科学实证主义得到普遍认可。“不能被经验实证或证实的任何之物皆被视为无意义的。”^[8]唯科学论在人类的思想领域盛行,促使哲学家急于在自然科学中寻求办法。“就连哲学家现在也开始明白,再用形而上学的方法研究实在的时候,科学的方法和成果是现有的最好不过的证据,而一种新的实在论,如果可能的话,就必须利用这些科学的方法和成果来建立。”^[9]哲学家们坚信,“西方人文社科可以说没有超乎科学论之上的。”^[10]因此,各学派努力与科学论相附,试图从科学论的角度完善本学派的体系结构,哲学也不例外。哲学的“语言转向”即是人文科学的产物。二是数理逻辑与语言的结合是工业革命实践的需要。哲学家努力在自然科学中寻找新的逻辑符号,“它将排除自然语言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比自然语言更严格地遵守规则。……无歧义地达到同样的结论”^[11]数学恰好符合这个要求。因为“语言学历来被看做典型的人文科学,数学则被许多人看做是重要的自然科学”^[12]。语言转向之前,1851年英国数学家德·摩根(A. de Morgan)用统计学研究语言风格;英国数学家尤勒(G. U. Yule)1944年用同样的方法进行语言研究并发表《文学词语的统计分析》一书。然而,当时用数学方法研究语言的方法并未使语言研究发生重大变化,“这主要是由当时社会实践的要求决定的。因为当时的语言学,主要是为语言教学,文献翻译、文学创作和社会历史研究服务的。在这样的社会实践要求下,语言学没有多大的必要与数学接近。”^[13]更谈不上数学与传统逻辑相结合分析研究语言哲学的问题。工业革命致使科技成果不断涌现,一系列的社会变化促使哲学家寻求新的方法研究解决大量新的语言现象—经验问题,社会实践也要求哲学家借助自然科学的成就寻求对哲学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数理逻辑方法在语言中的使用便应运而生。

(二) 促进了现代语言科学的建立

哲学家认为哲学的表达是通过语言来完成的,所以语言是哲学完成自身课题的必由之路。“可是,哲学通过语言来表述,自古皆然,因此,这一事实最多说明为什么语言自古以来就受到哲学家的特别关注,却说明不了‘语言转

向’。”^[14]然而,结构主义学派却不以为然,他们把索绪尔现代语言学思想的建立提高到使语言学成为“领先科学”的高度看待,^[15]并认为索绪尔之后,“语言已经不是作为工具出现在人们的眼前,语言作为一个本体成为哲学的第一要素。”他认为索绪尔的现代语言学派“使语言学获得了领先科学的美誉”^[16]。上述观点对现代语言科学促进语言转向的作用,因其立场不同而说法各异。但实事求是的讲,虽然哲学自古就是通过语言来表述的,但现代语言科学建立之后的语言学理论与过去截然不同。即使现代语言科学对语言转向的作用没有结构学派说的那么重要,它对传统语言学狭隘性的批判使人们认清了语言的本质,对语言转向做出了贡献,至少为语言转向提供了较为完善的语言科学体系和可能的途径。

现代语言科学的建立和完善是工业革命影响的结果。20世纪工业革命的四项进步之中,交通工具的改进和通讯工具的发明对语言的影响巨大,其直接影响是自然语言的交流量和交流范围剧增,语言作为交流工具得到空前运用。但在信息传输中,语言本身的弱点更加显现。自然语言本身的某些特征与社会实践存在着不适应性影响了语言的应用,需要哲学指导以建立新的语言体系。索绪尔提出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和线条性两个特征。随着语言实践的增多,又有学者提出语言符号七大特征之说。^[17]江怡认为,语言学每次发展的背后都以哲学作为推动力,或者说正是由于语言学家能够从哲学的视角看待语言,处理语言问题,他们的语言学理论才真正更具有普遍的价值和深远的影响力。^[18]

社会发展需求为现代语言学派提供了客观依据。20世纪前后,社会发展为现代语言学派提供了大量的自然语言研究素材,同时,交流载体与语言的不适应性向语言学家提出了构建统一、高效、完善的语言科学体系的要求。对现代语言学派来说,对自然语言的研究和分析才是研究的最高境界,其研究的首要目标是澄清语言的本质:以最接近于人的生活世界的自然语言为依托全面解析语言,使人们正确了解语言,澄清对语言的误解。在这种情况下,现代语言科学开始发轫。

(三)推动了哲学人文性的回归与古典哲学的终结

海德格尔非理性语言研究使哲学从自然科学主义回归到人文主义,在20世纪上半叶的欧洲大陆占有重要的哲学地位并对哲学的语言转向发挥着重要作用。海德格尔的老师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认为人的生活世界体现的是理想世界的一些相对和偶然的实例而非全部。他试图通过“加括号”为人的生活 and 世界发生的事情找出一个普遍必然性领域作为绝对的、合理的参照系。“先验现象学”高高在上,远离20世纪西方工业革命发展的需要,脱离当时社会和自然语言,缺少人文关怀和文化重建的意识。海德格尔在胡塞尔的现象学基础上独树一帜,建立非理性的存在主义哲学,把语言与存在放在了等同的地位,关注诗意地存在着的诗性语言。他认为“诗性的语言来自自然语言,但它是自然语言的一种净化。”^[19]海德格尔非理性的存在主义是“接地气”的语言哲学,反映语言的真实状态,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对哲学语言转向的赞美是实用主义的,适应了工业社会发展的需要。

工业革命为哲学的语言转向提供了土壤和动力,助推古典哲学终结。语言转向之前,古典哲学尤其是德国古典哲学对认识能力的研究始终对一些问题纠缠不清。在认识论后期,人们发现哲学家们并未解决人的认识来源、过程、能力等基本问题,而论证这些问题的概念、命题等往往自相矛盾。各学派有关本体论和认识论的绝大部分命题是空泛、无意义、没有实质内容的、形而上学的。面对工业革命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古典哲学却无能为力,使原本脆弱的传统哲学雪上加霜。哲学自身发展的矛盾导致哲学与社会发展的矛盾更加激烈,致使哲学发展裹足不前。哲学家对古典哲学出现感情上的“厌倦”,行动上的“抛弃”,渴望寻求新的方式方法,摆脱传统哲学的束缚。在科学主义思潮的面前,工业革命逼迫哲学寻找新的理论体系,哲学的语言转向让人们看到了一线希望,同时也成了古典哲学的掘墓人。正如 W·C·丹皮尔所言,“进化论的生物学以及现代数学和物理学,一方面使科学思想臻于深邃,另一方面又迫使哲学家对科学不得不加以重视,因为科学现在对哲学、对神学、对宗教又有了意义。”^[20] 1886年,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进一步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是哲学发展上的伟大革命的产物。科技发展的进步和科学哲学在西方人文科学领域的运用终结了传统古典哲学。工业革命从以上三个方面促使哲学发生语言转向,并同样影响语言转向的目标和发展趋势。

三、效率原则对语言与哲学队伍的影响

阿尔文·拖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提出工业阶段包括六个控制人们行为的相关原则,“这些原则起源于生产和消费的分裂,影响及于生活的每个方面,从性、运动到工作和战争。”^[21] 其中有些原则同样对哲学的语言转向产生影响,较为突出的是效率原则对语言标准化和哲学家专业化的要求。

(一)“标准”语言的统一与“母语意识”的丧失

工业革命的标准化触动了构造“标准”语言的企图。美国的 E·惠特尼 1798 年开始标准化尝试,1947 年世界上最大的“国际标准化组织”诞生。工业标准化令一些思想家坚信各领域的标准化是合乎工业化效率的。统一标准的美语、英语、法语等语言取代了“不标准的”语言,如英国政府使用行政权力禁止使用少数人的语言,大众传播的影响“使得威尔士语(Welsh)和阿尔萨斯语等方言,甚至整个语言几乎全部消失”^[22]。受工业化控制人们行为原则和分析主义语言同构状态的影响,部分哲学家对语言研究提出要求:把语言形式的标准化和对语言意义理解的统一性贯彻到哲学的语言转向之中。他们要用分析主义的观点构造一种纯形式化的语言,“用逻辑概念来重新定义所有的算术基本概念,并证明所有合格的算术推理都遵循逻辑推理的规则。”理想语言学派致力于构造普适的人工语言并希望其成为一切科学的工具。这种纯形式的人工符号系统排除了自然语言的弱点,不受制于语言使用的具体背景。只需遵循普遍的逻辑句法规则,任何人都可以实现对语言意义的统一结论和对同一个命题的相同的理

解,从而提高科学研究的效率。为了符合工业化的效率原则,哲学家们所设计的语言必定是标准化的,要求在意义理解上无歧义地统一。

然而,统一“标准”语言的企图导致“母语意识”的丧失。语言相对理论派生的“母语意识”是西方语言哲学的核心之一。母语是“理解自身、理解本民族历史和文化的基礎,也是跨语言交际,跨文化交际的基礎。没有母语,我们就找不到自身”^[23]。母语意识认可“每一个具体的人只能通过母语去认识和表达世界”^[24]。工业革命初期,西方国家使用粗暴的手段对语言进行的所谓“标准化”,致使一部分地区的人丧失了母语。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与语言转向初期哲学与语形学相结合的目标相似,但随着哲学与语言深度结合,则削弱了从文化层面对多样化自然语言的研究,阻碍了自然科学与人文性的融合。

(二) 哲学队伍专业化的呼声

工业革命的效率原则促使社会分工细化,对行业队伍提出专业化要求。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决定了哲学家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哲学家队伍专业化成为必然。首先,工业化革命的社会发展背景要求科学理解和自然理解建立强有力的沟通,这个任务理应由哲学家承担。工业化的变革使哲学的主要工作由原来的对世界的基本结构的理解、获取一套关于人类活动和社会组织的标准转变为概念思辨,哲学家要把主要精力用于了解科学技术概念的自然理解。完成这项任务,需要从事哲学研究的人具有哲学家的基本素质并向专业化方向发展。其次,语言转向时期的哲学家的水平参差不齐。许多人原本从事其他学科尤其是语言学的研究,后进入对语言哲学的研究领域;有的哲学家没有受过严格逻辑训练,不能严格遵守逻辑规则,语言也不能完全准确地表达意思,在这一点上即使是维特根斯坦的哲学功底也有待提高。哲学家们对哲学领域中的状况不满,他们认为哲学家只有专业化才能像科学一样构建起新的世界。哲学家专业化的呼声吻合了工业化革命的效率原则。

四、工业革命推动语言转向

20世纪后期以来,哲学界针对语言转向是否符合时代的发展需要、是否已成为过去争论不休。其代表人物是牛津大学的哈克(P. M. S. Hacker)和威廉姆森(Timothy Williamson)。威廉姆森认为“语言转向已然成为过去,对于20世纪60年代以来哲学的发展,我们需要一种新的叙事结构。我们在语言转向上可能陷得太深了”^[25]。哈克的结论则相反。他认为不能抛弃语言转向,而要从错误路上重新回到语言转向上来。虽然两者都认同摩尔对哲学的任务的理解,“哲学的首要的并且是最重要的问题是:对整个宇宙作一个一般性的描述。”^[26]但威廉姆森在用什么途径了解世界时试图抛弃分析语言的方法而直接通过分析思想获得,哈克则坚持语言作为理解世界的通道。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发展和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来临,语言哲学发展的内在必然和工业革命外在驱动都证明哲学的语言转向不仅不会终结还将继续发展。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哲学的语言

转向影响着诸多学科向语言转向并成蔓延趋势;其二,语言哲学自身发展的需要决定哲学与语言的结合更加紧密;其三,随着哲学与语言结合的不断加深,诸多学派将成融合趋势,共同构建新的哲学思想平台。

(一) 工业革命的作用

语言转向的发展历程与工业革命发展的不同阶段密切关联。第二次工业革命推动了语言转向的发端和形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科学技术迅猛发展,文献的数量增长速度十年翻番。专家估计,我们目前每天在互联网上传输的数据量之大,已经超过了整个19世纪的全部数据的总和……,^[27]并推动陷入僵化语形学研究的哲学向语义学研究转变。进入21世纪,互联网技术与可再生能源的即将融合,为第三次工业革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8]也为进一步研究哲学语用学提供了更加坚实的基础,并推动哲学实现从语形学、语义学到语用学研究的发展历程。

互联网多媒介技术的发展将助推语言转向的蔓延。多媒介与语言一样都是交流载体,是“人的延伸”,应同属于广义的“语言”概念。人类的思维通过媒介反映客观事物,语言是思维的一种媒介,多媒介也是思维的媒介。多媒介的优势在于多感知系统的综合运用。从医学的角度看,语言是通过人的左脑来处理讯息的,而多媒介是“多感知系统的综合运用”,它不但通过人的左脑处理语言,而且也通过人的右脑进行图像化处理。由于多媒介刺激受众注意力的感官因素比语言要多,它与语言的结合对于人们理解世界,准确描述命题,具有单纯使用传统语言无可比拟的优势。多媒介还有利于提高人们的认知能力,对于推动认知语言学产生尤其重要。语言学认为语言处在外部客观世界和人类思维主观世界中间的第三世界,人只能通过语言才能认识世界。而认知语言学认为在语言和外部世界还有一个认知层次,语言由于认知的作用才能建立与客观世界的联系。多媒介用多种手段呈现客观世界,给人们提供最全面的信息,提高认知能力,使认识理解客观世界的程度较之传统语言得到大幅提高。

(二) 语言转向的趋势

互联网多媒介与语言结合的优势使其他学科认识到哲学的语言转向给哲学带来的益处,从而引发诸多领域的语言转向。首先,哲学的语言转向对其他学科的影响更加广泛。作为对具体学科具有一般性指导意义的领头羊,哲学研究方向的变化必然影响和推动其他学科和领域研究的变化。哲学的语言转向带动其他学科的研究向“语言哲学转向”,“各门学科会循着哲学语言转向的途径开展本学科的研究”^[29]。从20世纪初甚至不到20世纪结束,语言转向就延续了诸多学派并影响到许多领域。进入21世纪,以互联网技术发展为主要推动力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加速了诸多学科流派向语言转向的势头,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语言转向在诸学科中不断蔓延,诸如文学、艺术、社会学、国际政治学和文化领域的语言学转向等。语言转向在20世纪尚未结束之际,各色“转向”纷纷产生,如“自然主义转向”“实用主义转向”^[30]“实践转向”^[31]“认知转向”^[32]等,说明当

代哲学的语言转向仍继续延续并且向更加广阔的学科和领域蔓延。

其次,哲学与语言的结合越加紧密。两者的紧密结合源自两个方面。一方面,哲学角度的哲学语言化程度不断加深,实现了从语言语形学逐渐向语义学、语用学方向发展,“三段式发展路径”^[33]勾画出哲学和语言结合的发展轨迹。语形学是哲学向语言转向的早期阶段,较早的语形学分析方法在希尔伯特的“元数学”中有所体现。^[34]工业革命初期,受到自然科学和科学技术进步的影响,哲学与语言的结合受自然理性学说的影响局限在语形学领域,形成了普适的物理语言。然而,语形学在构建自然命题时将形式理性绝对化,并与多样化的自然语言构成不可通约性的弊病,满足不了工业社会进一步发展对哲学提出的要求。进而哲学进一步与语言融合,切入点与语义学结合,研究语言符号和所指对象间的关系。语义学对语句意义的解释克服了语形学的难题,暂时满足了工业社会发展的需要。但随着工业社会对社会文化交往的要求不断提高,哲学与语义学结合的弊端逐渐显露出来。语义学对语言意义的理解与解读仅限于语句本身而未将其置于整个社会的文化领域背景下。哲学进而与语用学进一步结合把语言意义的构建置于更为广阔的社会文化平台上,从而把握语言的文化意义,适应以多媒体互联网时代为主要特征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发展要求。另一方面,语言角度的语言哲学化程度不断提高,语言研究与哲学靠拢,实现语言的哲学转向。语言研究向哲学靠拢,能够从语言观的高度深入研究、评价不同的理论体系。20世纪的语言学理论的数量是以往语言理论的总和。这一时期语言学繁荣的根本原因是语言学家站在哲学的高度研究语言问题,使语言学家把哲学家作为本体的语言当做自己本体的核心并研究“语言是什么”的语言观问题,从而为20世纪产生诸多不同的语言理论创造了条件。

最后,学派之间进一步融合。伴随哲学对语言研究的深入,欧洲大陆学派与英美学派等诸多学派相互融合。语言在摆脱了使用语言语形分析手段解决哲学问题而形成的语义哲学后,语言哲学的诸多学派看到哲学与语用学结合的强大生命力,纷纷加入到语用哲学的研究之中并相互取长补短。“英国的言语行为理论、法国的对话理论、德国的普通语用学和美国的符号学”^[35]共同形成了新的语用学成果。20世纪70年代,奥斯汀、斯特劳森、塞尔等哲学家借用语用学的成果构筑了哲学对话的语用哲学新平台。在语用哲学的基础上,语言哲学家运用语用学的“意向”“心理”概念解决语言和客观世界之间存在的认知问题,形成了认知哲学,使学派的融合更深入。本文认为,哲学向“语用学转向”使原本学派林立的语言哲学界有了共同的基础和相同的发展目标,学派间的融合成为可能和必然。

上述三点说明,哲学与语言逐渐密切结合确定了哲学语言转向的发展趋势。哲学与语形学、语义学、语用学逐步递进结合的过程体现了从科学主义到人文性的相互融合,为当今适应人类社会发展的认知科学的发展提供了语言哲学的依据。

综上所述,西方哲学发生语言转向,除了哲学自身的原因,工业革命的发展

起到很重要的推动作用,给 20 世纪自救的西方哲学提供了客观上的可能性。自然科学发展与技术进步为语言转向提供了“唯科学论”的思想土壤,数理逻辑的产生提供了科学的理性主义思想的支持;人类的广泛交流为语言转向的研究提供了大量自然语言和语言现象—经验研究的现实素材;社会实践需要凸显了语言在当时哲学中的地位,使哲学的语言转向成为客观需要。工业革命作为语言转向的外部条件不仅影响着语言哲学的构建,对语言和哲学家提出了诸多要求而且决定了语言转向的发展趋势。工业革命对语言转向的影响是较为直接的外驱动力,其中对语言转向今后发展趋势的影响作用还有待于今后社会实践的证明。

注释:

[1] Richard Rorty, *The Linguistic Turn: Essays in Philosophical Method*,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7.

[2][3][11][14] 陈嘉映:《语言哲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3、4、79、14页。

[4][美]阿尔斯顿:《语言哲学》,N J: Prentice - Hall Inc. 1964。

[5] 涂纪亮:《西方语言哲学研究的现状与前景》,《外语教学与研究》2003年第5期。

[6] 梁树发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91页。

[7] 尹书范:《哲学进步与社会发展》,《沈阳农业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

[8][10] 江山人:《“语言学转向”是一大歧途》,新浪博客发表时间:2013年6月3日,网址:<http://blog.sina.com.cn/rliuz>。

[9][20][英]W·C·丹皮尔:《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李珩译,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37页、原序第2页。

[12][13][17][25] 冯志伟:《语言与数学》,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1年,序言、第2页、前言、第3页。

[15][16][19] 刘艳茹:《索绪尔与现代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外语学刊》2007年第4期。

[18] 张清俐:《语言学研究需要哲学视角》,《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5月14日。

[21][22][美]阿尔文·托夫勒:《第三次浪潮》,黄明坚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6年,第33-37页。

[23][24][29] 潘文国:《从哲学研究的语言转向到语言研究的哲学转向》,《外语学刊》2008年第2期。

[26] Peter Hacker: “Analytic Philosophy: Beyond the Linguistic Turn and Back Again”, edited by Michael Beaney, *The Analytic Turn*,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p. 140, note 16.

[27] 胡欣诣:《“语言转向”已成过去了吗?——哈克与威廉姆森之争》,《哲学分析》2012年第5期。

[28][美]杰里米·里夫金:《第三次工业革命:新经济模式如何改变世界》,张体伟、孙豫宁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

[30] William Egginton & Mike Sandbothe, *The Pragmatic Turn in Philosophy*,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0.

[31][英]西奥多·夏兹基等编: *The Practice Turn in Contemporary Theory*, London: Routledge, 2001.

[32][美]乔姆斯基:《当代国外语言学语用学应用语言学文库》,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年。

[33][34] 李虹:《语言哲学的三段式发展路径》,《求索》2010年第3期。

[35] 曾文雄:《中西语言哲学“语用学转向”新解》,《安徽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

[责任编辑:嘉 耀]